

蕭麗紅小說的語言建構與鄉土想像

陳美妃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母語書寫與書寫女人是蕭麗紅小說極其重要的特色。二十年的寫作，蕭麗紅的母語表達日見成熟，尤其晚近的白水湖春夢一作，堪為「台語如何文字化」與「台語能否文學化」的重要檢驗及啟發。二戰過後，結束殖民地命運的國度，積極地以文學創作或文字紀錄等方式來保留母語並薪傳母語文化，這是後殖民文學的珍貴共相。這種用「我的語言」，述說「我的生活」「我的文化」的創作，基本上，就有顛覆威權和宣示自主的意涵。蕭麗紅就是以長篇小說為載具，裝填了台灣小鎮的庶民文化：口語俗話、生活智慧，節令禮俗。這些已融入生活的文化和儀式，透過女人，代代接續相襲，成為文化身分的認同。蕭麗紅述說女人，女人述說習俗，習俗述說鄉土；只要禮俗文化繼續搬演，鄉土就活著。蕭麗紅意圖以「母語」傳襲「文化」重構「鄉土」。但是，重構不等於還原，重構裡，必然富含作者對鄉土的寄情和期待。這種一廂情願，往往透過小說的結構、人物、情節來具體呈現。當蕭麗紅的小說以淨化的語言，無爭無怨的故事情節，「重構」了一個親切純良寬恕救贖的鄉土時，蕭麗紅也同時「虛構」了鄉土。

關鍵詞：母語書寫、後殖民、文化屬性、鄉土記述、鄉土想像、重構、虛構

1. 引言

母語書寫，是蕭麗紅小說極其重要的一項特色。從桂花巷（1977）、千江有水千江月（1980）、到白水湖春夢（1996），二十年的寫作，蕭麗紅經營母語的用心，恐怕不在架設小說架構或情節主題之下。在小說行文中穿雜母語，蕭麗紅不是台灣第一人，黃春明的鄉土文學才是先聲；但是以母語思考並書寫，蕭麗紅絕對是鄉土作家的前鋒。在蕭麗紅的作品裡，母語不只是市井小人物個性的襯飾，或親土親水的象徵，而是小說世界的骨血：是一種文化屬性，一種內在意念，一種鄉土面貌的還原和展示¹。母語人情是蕭麗紅所欲彰顯的故鄉，因此，一旦抽離母語情境，蕭麗紅的作品，難免就要被當成

¹ Bill Ashcroft, Ga Re 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重置語言：後殖民寫作的文本策略〉《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第二章》（駱駝出版 1998）。

了填充浪漫迷思的通俗文學²，或私人浪漫愛情小說³。

母語情境，是蕭麗紅小說的神髓。但是，大量的母語書寫和全篇不得不的記音借字，對習慣以「國語文」為唯一思考和書寫的閱讀大眾而言，無疑是個障礙。不懂福佬方言的閱讀者，只能略過方言，跳躍地閱讀出一個愛情故事的輪廓；而熟悉福佬話的閱讀者，往往又要受困於記音借字的疑義中，猜測文意。難怪論者要堅持蕭麗紅的方言寫作方式非常不恰當，犯了一個「以為本土文學就必須以方言書寫的嚴重錯誤」⁴。

在「母語書寫」、「女性書寫」和「書寫女性」仍是當今世界文學思潮的主流之一的今天，符合此一思潮的蕭麗紅的作品，卻沒能得到相對等的重視和討論。究其原因，除了母語書寫所帶來的閱讀困難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外，蕭麗紅作品的「非主流」性，可能更是一個要緊的關鍵。

作為一個鄉土作家，蕭麗紅是顯得尷尬。因為她少了王禎和等男性鄉土作家的戲謔諷刺之筆⁵。她的小說，雖然一樣是鄉土小人物的世界，但是沒有籌設妓院的英文教師（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也沒有帶著敵人蹂躪自己女同胞的受薪業務員（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更沒有被剝削踐踏的悲情勞工（楊青矗：工廠人）；蕭麗紅的筆雖然一樣刻畫著小鎮風土人情和價值衝擊，但小說裡獨不見該被嘲弄反省或指控撻伐的對象或制度；蕭麗紅不挑戰傳統，不嘲弄禮教，不計算尊嚴重要還是外匯要緊。這也就是說，蕭麗紅寫的雖是我鄉我土我民，卻缺乏鄉土文學的標記——明顯的抗議精神。所以，當鄉土作家及其作品被文學研究者逐一檢視並安頓位置時，蕭麗紅不僅沒有自己的領地，甚且被指稱為「被收編的鄉土」⁶。

作為一個當代「書寫女性」的女作家，蕭麗紅一樣尷尬。因為，她的作品雖然描摩的盡是女人的處境和心思，但卻沒有被刻意強化的性別壓抑和兩性對抗，也沒有女體與情欲的放縱解脫，更沒有國族命運等於女性命運的聯想空間，甚至沒有與命運搏鬥的血汗⁷。蕭麗紅的小說不（敢）賣弄風情，不端詳同性戀，更沒有顛覆父權的指涉，是「存心要鬧革命的人看了不會過癮」的作品⁸。

²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聯合文叢 2001）頁 130。

³ 楊照：〈從鄉土寫實到超越寫實——八〇年代的台灣小說〉，《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第二集》（聯合文學 1998），頁 182-185。

⁴ 見許琇禎：〈論文學語言的方言策略——以蕭麗紅白水湖春夢為例〉《孔孟月刊》（1995 9 月）頁 211-224。

⁵ 王德威：〈從老舍到王禎和〉《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時報出版 1986）。

⁶ 語出楊照。同註 3。

⁷ 對於女性文學及女作家的探討論述甚多。參見：王德威《閱讀當代小說》（遠流 1991）《重聲喧嘩以後》（麥田 2001）。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元尊 1997）。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新第 1992）。梅家玲主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麥田 2000）。鄭明嫻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人間 1993）。

⁸ 語出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1998 麥田出版）頁 173-174。

就是這些可能的因素，使得關心鄉土文學的論者，總把研究焦點停駐在黃春明王禎和或王拓等人的作品上，無暇顧及得過首獎的蕭麗紅⁹；而「女性書寫」的研究者，在熱衷李昂、施叔青、朱天文、平路等人的顛覆性、現代性、複雜性、多樣性時，根本來不及解析蕭麗紅這樣平淡的作品¹⁰。

雖然如此，蕭麗紅的作品及成就，實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和地位，尤其是以母語思考並且以母語書寫的這一項試驗，應是台語文學發展的實際例證。這個書寫方式不僅透露出作家追求本位尊嚴的企圖，更突破「國語文＝文學市場」的獨佔迷思，是現階段討論台語「能否文學化」及「如何文學化」時，一個重要的檢驗及啟發¹¹。

2. 母語書寫的後殖民意義

語言，作為溝通工具，不僅止於「訊息」的傳達而已，更是同一語言使用者間「情」的牽繫、文化身分的認同、及生活智慧的承襲。所以，若要掠奪一個族群的主體性，第一步就是利用政治優勢阻斷或封殺當地語言；同樣的，一個被壓抑的族群，總也是透過「使用自己的語言」來宣示自主的覺醒和能力。正因如此，語言往往成了政治勢力消長的具體指標。二戰之前的殖民時代，每一殖民宗主國，都以自己的語言文字取代殖民地的母語，而成為一時一地之「正統」。這些正統，透過教育推廣與法令保障的雙重利勢，搖身凌駕母語之上，壓縮母語生存空間，扭曲或中斷殖民地語言文字的正常發育。箝制母語，成為殖民國對殖民地人民進行文化侵略和思想改造的普世手段¹²。

二戰過後，結束殖民地命運的國度，遏止或修補既成的文化傷害的第一步，就是重拾自己的語言。透過「我的」語言，講述「我的」經驗，書寫「我的」故事，重構「我

⁹ 《千江有水千江月》係 1980 年聯合報小說首獎作品。該作獲選為文建會中書西譯作品，英譯本已於 2000 年 3 月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發行。

¹⁰ 一般文學評論者，鮮以蕭麗紅作為探討主題。近期出版的，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下兩冊（女書文化出版 2001），並未選錄蕭麗紅的作品。

¹¹ 經過多年的努力，台語文字化的工程尚在初階階段。台語文如何定字，如何避免國語文思考，如何規避聲腔轉換式的書寫和閱讀，截至今日，仍無普及定論。蕭麗紅的創作，明顯展示他努力於「追求本字」的熱心，後出的白水湖春夢，借字記音的情況相較於前兩部作品，明顯減少。但是，雙重視野雙種文化語言的互擾，仍使蕭作存在聲腔轉換或文法錯置的書寫。蕭麗紅的努力，堪為台語文字化工程的借鏡。

¹² 英國佔領肯亞其間，肯亞小孩如果在校園裡說母語，就得受罰。處罰方式包括體罰、罰錢、在脖子上掛「我是笨蛋」的牌子、舉發其他講母語的同學等等。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對待非洲和拉丁美洲講母語的殖民地小孩，都有相類似或獨創（比如，以肥皂洗嘴巴）的處罰花招。這些外力，可以使該地區的語言因受挫而步向死亡。參閱：大衛 克里斯托 著 周蔚 譯《語言的死亡》第三章（貓頭鷹出版 2001 03）。

的」文化，尋找「自我」肯定，以期達成文化的「去邊緣化」或政治的「去殖民化」。在這個自我尊重的覺醒過程裡，民俗、風情、口謠等最自然貼近鄉土的這一環文化，尤其受到矚目，而被以各種形式和方法紀錄、書寫、保存；文學成為爭取自我界定的有力媒介。這是後殖民文學理論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珍貴共相¹³。

因此，母語（或方言）作為一種書寫主體，本身就帶有顛覆威權和重構鄉土（自我）的意涵。只是，經歷過文化或政治殖民的作家，在被支配的歲月裡，就因為學習了或熟悉了對方（支配者）的語言和文化內涵，往往擁有「雙重視野」(double vision)。他們同時使用兩種語言，有兩種文化背景，有兩副面孔：一副對著自己，一副對著「他者」。這個雙重視野，使作家在追求自己的語言、文化的主導地位的同時，不但無法與舊宗主勢力切割出截然的界線，反而包容了相當程度的被顛覆對象的文化或精神。他們在試圖修補失落的母語文化時，或許很自然的以「非自己的語言，傳達屬於自己的聲音」，或者「以自己的語言傳達了外來的思維」。這些表達上的不純化，在後殖民文學裡，並不構成瑕疵。就如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言：

本土文化以歷史重述、宗教復興、輓歌和懷舊詩歌等形式，發展成為啟發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前沿。為此，從殖民者那裡繼承下來的文學話語被挪用、轉用、調離中心、雜交混合。、、、往往帶有隨機行事的策略上的考慮和權宜的成分，他們成了表達自我的重要手段。¹⁴

既然，文化思維的交雜與語言文字的糾纏有其必然性，那麼，有關蕭麗紅師事胡蘭成，有「三三草」傾向，有張愛玲的筆意，有華族意識，有中華文化崇拜情結等等的指稱和疑慮¹⁵，在此顯得多餘；當然，對於大陸學者所倡言的：蕭麗紅「明白無誤的傳達著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力圖全面的價值肯定」¹⁶，也不必在意，畢竟，賴和也一樣被大陸學者拉攏標榜為「熱愛祖國」的典範¹⁷。

本文所要探究的是蕭麗紅利用她的小說框架，填充了什麼質性的母語，什麼樣相的文化。她的三部主要長篇：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白水湖春夢¹⁸，到底結構出一個

¹³ 參閱：《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¹⁴ 博埃默著，盛寧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牛津大學出版 1998）。

¹⁵ 楊照首開此說，王德威及張誦聖均有所呼應。見：〈從鄉土寫實到超越寫實〉楊照：《夢與灰燼》（聯合文學 1998）。

¹⁶ 趙園：〈蕭麗紅的小說世界—讀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1990 6）頁 148-154

¹⁷ 參閱：白少帆等四人主編：《現代台灣文學史》（遼寧大學出版社 1987）。

¹⁸ 蕭麗紅的這三部作品跨騎在台灣民主化指標的兩端。1987 年，台灣解嚴，原本潛伏的本土自主意識旋

什麼型態的鄉土。這樣的鄉土，是客觀描繪的「寫真鄉土」？抑或作家主觀召喚所得的「想像鄉土」。

3. 庶民人情與鄉土寄情

蕭麗紅的三部長篇作品，一個設景在台南漁村，一個落址布袋漁港，另一個以新營鹽水為主要背景。這些地方到底等不等同於地圖上或歷史上同名同稱的某地某城某鎮或某街，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被擇用的地點，都是南台灣的典型小鎮，相較於日新月異變化萬端的都會城市，他們多了幾分保守與隔離特質。這種鄉里，是庶民人情展演的理想所在，是傳統文化的據點。

傳統與文化不可能脫離庶民而兀自流傳，尤其生活文化一環，更是需要族群的認同和實踐，才能永續不墜，成為共同的經驗和感情的交集。生活文化的傳承，不靠學校，不用書本，是由女人家們在內屋隨性展開，不著痕跡地交棒，也因此「廚房」往往成為薪傳生活文化的主要據點。生活文化的種種講究和儀式，就是這樣從家庭裡長一代女性的喉舌，轉遞到下一代女眷的手中，一長一幼又一長一幼的如此接續。一如貞觀看到街上老婦燒過紙錢後，唸唸有詞地在「金鼎外圍圓圓灑下一杯酒」時所說：我當然知道她在唸什麼，「我母親和外婆，也是這樣唸的——沿著圓，才會賺大錢！」（千 163）。外婆—母親—老婦—我，女人就這樣「當然知道」了祭神拜鬼、逢年過節的一切。這些禮節、傳說、禁忌，融入日常，成為歲歲年年裡一種理所當然的文化節奏。這些被代代沿襲的細節或儀式，有些我們知其然，更多不知所以然。但知與不知，都不妨礙這些禮俗所象徵的人情凝聚和文化認同。只要禮俗儀式繼續搬演，只要女人繼續述說，鄉土就活著。蕭麗紅述說女人，女人述說習俗，習俗述說鄉土；蕭麗紅「書寫女人」，更透過女人，書寫台灣，延續鄉土。

蕭麗紅的書寫裡，台灣的習俗節令、俚語俗說、偏方兒歌、童玩把戲等，這些最「根性」的印痕，都是召喚鄉情架構鄉土的媒介和主體。

1) 習俗節令

a. 端午節的「午時水」，可祛疾消災（千 54）；

即勃發。1990年，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終於解密，官方與非官方的相關研究和訪談記錄，充斥學界和出版界。蕭麗紅的鄉土情懷自然不可能忽略此一大事，白水湖春夢以二二八為時代背襯，也就不足為奇。時代背景縱便辛辣，人物造塑一樣理性溫馴，作品中所反應的「二二八後遺症」如反對小孩受高等教育、反對政治、省籍排斥、暗怨政府等，是一個被普遍認識的現象，算不上是作者獨到的見識。故本文不在此處討論作者的特殊思量或用心。鄉土造塑與母與書寫的用心才是本文的主題。

- b. 新嫁娘記得在端午分贈親友香包（千 50）；
- c. 七夕的「圓仔」不比冬至，得押個凹痕來裝眼淚才行（千 22）；
- d. 拜七娘媽的油飯要記得鋪上芙蓉菊（千 24）；
- e. 冬至的紅圓拿來黏門頭，才會家庭滿圓（白 29）；
- f. 吃人家的滿月油飯要懂得「回白米」（千 183）。

這些共有的生活經驗，節令記憶，進駐到蕭麗紅的文字裡去，上元、清明、端陽、普渡、中秋、過年，按著年節召喚讀者的故鄉；一如貞觀按著年節回家一般。節令禮俗，竟是文化的家鄉。

2) 偏方兒歌童玩

- a. 除了節令禮俗，民間偏方與童玩遊戲也都是建立共同感情和鄉土認同的力量。梗了魚刺要吞麥芽糖（千 33），
- b. 沾了醬油的衣服用藕汁才洗得掉（桂 238），
- c. 青蛙鮮肝敷疔瘡有效（千 212）；
- d. 收驚除了一杯米一杯水一件衣外，又是如何做法念咒（桂 179）；
- e. 小孩兒掉落的乳牙該往哪裡扔（桂 217）；
- f. 「撿穀粒」怎麼玩法（千 141），
- g. 「雞仔號啾啾」又怎麼算輸贏（千 144）；

這些，呼喚著蕭麗紅和文學大眾的共同鄉土。

3) 俗說俚語

如果，語言是某一群人以其絕無僅有的集體智慧所締造出來的至高成就¹⁹，那麼，「俚語俗話」就是歷經歲月萃煉的語言精品，是族群的生活智慧、價值理念、基本道德、甚至審美態度的凝結表現，是文化情境的表徵與內涵。一個語言環境中人，視俚語俗說為生活中的天經地義，能在不自覺的承傳中，延續前人的思想，建立文化身分的認同。但是，一個未能深入某種語言情境的人，卻不可能憑藉翻譯，與此一簡潔語言背後的文化精髓和生活哲學交融。畢竟，兩種語言（文字）互譯，雖然可以解意，卻不可能交換思想、思考和文化屬性。也就是說，翻譯，只能瞭解「怎麼說」卻不能傳達「怎麼想」，

¹⁹ 《語言的死亡》第二章。

當然就更不可能移植或複製語句音韻節奏間的美感。

沒有掌握他們的口頭文學、儀式、民俗、和其他一些知識之前，那故事中對於世界的看法是根本進不去的²⁰。

顯然，除非對俗話俚語或生活典故有深切的掌握，否則一個閱讀者很難融入由他人的母語俗話所構設的世界，更不可能體認這樣一個語言世界裡的人情道德和價值堅持。俗說俚語精斂簡潔卻寓意豐富，對外部人而言，是難以突破跨越的藩籬高牆，對語言內部人而言，卻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是共同感情的召喚。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句俗話，往往就能發揮牽引鄉土凝聚力的微妙作用。

蕭麗紅寫鄉土，就利用小說文本，積極保存了俚語俗說這項極為豐富的鄉土智慧、人情、價值觀。

- a. 「錢銀三兩千，未值子婿出人前」（桂 72）
- b. 「三斤貓咬四斤老鼠」（千 21）
- c. 「食人一斤，也得還人四兩」（桂 65）
- d. 「做雞就蹭，做人就捱」（白 7）
- e. 「糜燒傷重菜，某妹傷重夫婿」（白 21）
- f. 「若賺失德錢，就出討債物」（白 56）
- g. 「壞瓜多子，壞人多言語」（千 70）
- h. 「砌厝，無閒一冬，娶某，沒閒一工，娶細姨，無閒一世人」（白 95）
- i. 「和好人作夥，有布堪纏，和壞人作堆，有子可生」（千 62）
- j. 「惡妻逆子，無法可治」（千 65）
- k. 「生緣免生水，生水無緣上曲虧」（千 190）

凡此種種生活態度和人生歷練，在蕭麗紅作品裡，絕非偶然或點綴。蕭麗紅保留這類俗話的用心，是迄今鄉土小說的僅見。她可以為了多收錄幾句俚語，多流傳一些語言智慧，不惜破壞或中斷小說的步調，唐突的貼進一個場面，硬拗出一個不搭情節卻又可以用以收納俚語的環境空間。這種突兀的剪貼痕跡，只要是不太粗心的讀者大概都會察覺²¹。

²⁰ 《殖民與後殖民文學》，頁 271。

²¹ 《桂花巷》裡，這種情況最多見。如：一個丫頭沒緣沒由的進「奶奶」房裡問了一句：腿圓好看還是臉圓好看？這個突兀的插入，只為了保留「懂得肥的肥臉水，不會肥的才肥大腿」（會水的水面水，不會水的水腳腿）這句俗話。見：《桂花巷》（聯經 1977）239 頁。

4. 重構與虛構

作家，利用文學符號，傳遞一個特定的訊息意念；讀者，循著文本所指，接收訊息，然後經由想像與接受（感動），具體化作者的指涉。文學作品，就必須完成這個發收路徑，才能真正成就意義²²。作者的意念透過所摘選的文字、角色、情節，彙織成特定的圖像對外投射。只要投入的材料元素不同，投射出的意象情味自然有異。也因此，作品中的任何元素，都有引導作品面貌和質性的作用。作家就是這樣摘選元素來造境。換句話說，所謂創作，其實是作家「營造實境」並「推銷實境」的手段；而人物情節，其實就是作家心念的具體呈現。蕭麗紅就是這樣透過選材敷衍出一個理想鄉土的圖像，對讀者嫵媚招手。

4.1 淨化的語言醇化的鄉土

蕭麗紅筆下，管他長工、下人、打魚種田、擔蔥賣菜或販夫走卒，都共有一個特質，就是，誰也不把髒字帶在嘴邊。市井人物開口就「幹」，惱了就「國罵」，一起爭執就從祖宗八代問候起的真切話語，在桂花巷和千江月裡幾乎讓蕭麗紅給完全消音。蕭麗紅的鄉土不准粗魯。就連阿福的女人疑心乳母勾引自家丈夫，及阿恨錦水二個婢嫗爭風吃醋的那兩場驚天動地的奪情大戰，七八頁的篇幅中，最嚴重也只能出現「賤人、爛貨」（桂 190）和「菜店查某」（桂 286）這一等級的詞面，其他尖酸辛辣的潑婦罵街一概不准上台，更別說火爆扭打的狼狽場面了。

只是，一個真實的鄉土怎能如此乾淨，寫鄉土的蕭麗紅當然明白，於是，不文不雅的嘴巴，就交代給無心使壞小娃來負責：惠書對著日本人罵一句新學的「巴該壓露」，日本小孩想了半天，回了一句「X 你娘」（桂 208）；狗皮挨同伴揍，破口罵出「駛你祖母，敢打你祖公」（白 36）。除了這兩個娃兒之外，大人當中，大概只有殺豬的水龍，偶而「駛伊娘」（白 115）、「駛你祖公」（白 112）地用它們來當發語詞，可勉強抵湊算數。顯然，蕭麗紅的筆，不寫出言粗鄙的男人，不管，他們是如何的庶民和實在。

蕭麗紅的作品中，唯一展現鄉間罵街功力的記載，要算是兩個河邊洗衣的黑衣老阿婆的「夭壽仔，夭壽死困仔，路旁屍，蓋畚箕，捲草席，教壞困仔大小，死無人哭」（白 62）。而這一派毒舌，咒的可是一個既不在當事現場更不在小說角色裡的「局外」浪蕩子。沒有誰敢在蕭麗紅建構的鄉土裡對罵灑野。

²² 參閱佛克馬、蟻布斯合著，周英雄等譯：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書林出版 1998。

出身布袋漁港小鎮的蕭麗紅，不可能不懂台灣罵架文化的奧妙和神髓。寫鄉土小鎮卻無視粗鄙言語，顯然是蕭麗紅營造情境的「特意」而非「疏忽」。畢竟，多少被冷落有時的口語俗話民情傳說，都有機會被作者費神蒐羅編排出列，哪有一路沿襲不斷俯拾即是粗話罵語，竟是蕭麗紅陌生的領域。蕭麗紅蓄意打壓惡言惡語，而以乾淨的言詞營造厚道的意象：沒有惡言對罵的男人，沒有撕破臉糾纏爛打的女人，甚至沒有堪罵的無賴惡棍。蕭麗紅用質樸的言語抹出一張醇厚鄉土的面貌。

4.2 包容與救贖的鄉土

在三部小說裡，蕭麗紅縱便設計了不少「爭議」，卻不准有「衝突與決裂」。所以，有個五叔公來爭先人留下的一甲田產，就有外公和三叔公的甘心讓渡不多計較（千 57）；有個失散三十年已另娶妻室的大舅要返鄉認祖，就有個苦守家園老小一輩子的舅媽，以一句「多人多福氣」接納了丈夫的日本妻，進而明理地的退讓（我和國豐三五年，伊和他卻有三十年）（千 125）；寡居的高剔紅因懷有男樸春樹的孩子，而憂心「辛家幾代的聲譽，就要毀於一個北門嶼嫁來的女人手中」時，就會有個懂事貼心的兒子恭敬提出「想帶親娘赴東洋增加見識」來「拉她起來」，而保全「當家奶奶」的名節威儀（桂 306）；有爭風吃醋或鬧疑心病的女人家，就有明曉世情的主母長篇大論地排解，眾家女人也因感悟，而無爭無怨且通情達理。

蕭麗紅的小說世界裡，男人爭著讓產，女人爭著讓夫，公婆捍衛媳婦，子孫敬事公婆（孫媳婦擠乳汁滋養祖母）；而父權與威權不但不是女性壓抑與痛苦的來源，反而千真萬確的是女性尊嚴與救贖的寄託。蕭麗紅的小說裡，沒有為難、兩難或決裂的掙扎，舉凡現實人生最難處理的爭端：奪產、奪夫、奪妻、奪愛，在蕭麗紅筆下都成了圓融。這個無罪無惡的鄉土裡，盡是包容與救贖。

5. 結語

文學原本就具有極大的「意識反轉」力量。原本為威權者所輕鄙的「你們」的語言、「你們」的文化、「你們」的生活，經由文學的扭轉，都可以回到「中心」，成為值得尊重肯定的「我們的」一切。於是，女性文學，就把「你們女人家的見解」反轉為「我們女人家的看法」，以顛覆父權；鄉土作者，就把「你們家園」反轉成「我們家園」，而正視本土；把「你們的語言」反轉成「我們的語言」以強調自我；把「你們的文化」反轉成「我們的文化」，而珍惜傳統。意識反轉，是一個從邊緣來到中心的宣示，從「他者」來到「自我」的覺醒表徵。富含後殖民關懷特質的作者，尤其如此。

一個意在重構鄉土的熱情作家，著手重建家園人情時，絕不可能客觀寫實一如相機，或者，僅以採風素描來展示。以文字情節展開重構事業時，作家不免對那曾經是「現在」「實在」的過去，有一番寄情和修整。由於記憶可以被美化、被修補、被摘選，所以，文學上的「重構」，不會只是單純的還原，或者不會是準確的還原；重構，必然包含了相當程度的作家的一廂情願，也就是包含了虛構。這些用來重構/虛構鄉土的取樣，就是作家用以說服讀者的「真實」和「傳統」。

重構中之所以有虛構的存在，是作者對現實社會現象反撲的必然結果。如果，都會化的冷陌正在取代鄉土的溫情；如果疏離自私，正在蠶食原本人情的緊密；如果競爭與圖存的種種口實，正在積極吞噬淳風美俗；那麼重構鄉土，就有護持傳統文化的意義。虛構，一方面用來滿足作者撫今追昔的鄉土綺想，一方面寫來迎合文學消費大眾對「精神鄉土」的憧憬期待。當然，更重要的，是以此達到文化身分的傳承和連結。畢竟，傳統不會自己存在，文化不會自己傳承。就如王德威所言：

「故鄉」意義的產生肇因於故鄉的失落或改變，也尤其暗示原鄉敘述行為的癥結。敘述的本身即是一連串「鄉」之神話的轉移、置換及再生²³。

蕭麗紅確實以她的小說「重構併虛構」了一個無惡無罪、安分無爭、自足定心、又寬恕溫暖的鄉土標本。閱讀大眾或許並不指望亦不相信鄉土是如此婉約隱忍和悠雅，但顯然，作者的內心卻更渴求這個筆中的世界就是鄉土真貌，並意欲以此說服讀者。蕭麗紅的寫作，幾個不冷不熱也夠不上值得歌頌的愛情故事，長篇的體制剛好成為民俗禮

²³ 參見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文學怎樣現代》（麥田出版 1998），同時收錄於劉紀蕙周英雄主編：《書寫台灣》（麥田出版 2000）。

節、口謠童玩、生活文化、和口語智慧的龐大載具，這些台灣庶民人情的載寫，有著明顯的傳承鄉土的意識，是後殖民文學可貴的精神。當母語（台語）經過長時期的壓抑扭曲，當台語文字的寫定尚有困難且莫衷一是的現今，蕭麗紅這位得獎作家，投注於母語與母語文化的心思絕非偶然。尤其白水湖春夢裡，一再斟酌琢磨的母語句法，是何等尊重這個幾乎被侍妾化的台語²⁴。

蕭麗紅用母語架構了一個鄉土，也不可或免地想像/虛構了一個家園。

²⁴ 台語，在經過日語與國語兩項「正統」語言文字的百年壓抑後，增生語彙的不足和原有語彙的失傳等等問題，使台語在作為「外部溝通語言」上，有不敷使用的困境。筆者認為，現今台語最大的危機，不在「有多少人會講」，而在於「國語思考、國語寫定、台語發音」的現象太普遍，以致於台語語法和語彙，已屈身為國語文的侍妾地位。其嚴重性值得正視。

參考文獻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1998. 《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劉自荃譯。台北：駱駝出版社。
- Boehmer, Elleke. 1998. 《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盛寧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Crystal, David. 2001. 《語言的死亡》，周蔚譯。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 Fokkema, Douwe and Elrud Ibsch. 1998. 《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周英雄等譯。台北：書林出版。
- 王德威. 1986. 〈從老舍到王禎和〉，《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 . 1991. 《閱讀當代小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 1998a. 〈玫瑰玫瑰我怎麼愛你〉，《眾聲喧嘩》。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 1998b.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出版。
- . 1998c. 〈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出版。
- . 2001. 《眾聲喧嘩以後》。台北：麥田出版。
- 白少帆等編. 1987. 《現代台灣文學史》。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
- 呂正惠. 1992. 《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第出版社。
- 邱貴芬. 1997. 《仲介台灣女人》。台北：元尊出版社。
- 邱貴芬編. 2001. 《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台北：女書文化出版社。
- 梅家玲編. 2000. 《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
- 許琇禎. 1995. 〈論文學語言的方言策略——以蕭麗紅白水湖春夢為例〉，《孔孟月刊》，1995. 9。
- 張誦聖. 2001. 《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
- 楊照. 1998. 〈從鄉土寫實到超越寫實——八〇年代的台灣小說〉，《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第二集》。台北：聯合文學。
- 趙園. 1990. 〈蕭麗紅的小說世界——讀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北京：《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0. 6。
- 鄭明娳編. 1993. 《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人間出版社。
- 蕭麗紅. 1977. 《桂花巷》。台北：聯經出版。
- . 1980. 《千江有水千江月》。台北：聯經出版。
- . 1996. 《白水湖春夢》。台北：聯經出版。

陳美妃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mfchen@ntut.edu.tw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Imagination in the Novels of Li-Hung Shiao

Mei-fei CHEN

Nation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riting in mother tongue and writing about women have been two significant features in the novels of Li-hung Shiao. Over twenty years of literary career, her mastery of using mother tongue has been fully recognized, especially shown in her recent works of *Bai Shuei Hu Chuen Meng* (白水湖春夢), a brilliant piece for examination and inspiration in the way of turning spoken Taiwanese language into the form of written text and literature. After the WW II, with the end of colonial rule by Japan, how to maintain the heritage of mother tongue and pass down its culture through literary and documentary writing has been a valuable phenomenon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uch literary creation by using “my language” to narrate “my life” and “my culture” basically, implies the declaration of self-autonomy and subversion of authority. Shiao fills up the vessels of her long novels with regional cultures of small towns in Taiwan --- vernacular and dialects, wisdom of life, customs, feasts and festivals associated with the signs of zodiac. Such cultures and rituals, represented in daily liv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rough her women, have become a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ty. Shiao narrates her female characters; her female characters live up to their customs; and their customs bring out localism. Localism lives on as long as these customs and rituals keep staying on the stage of daily lives. Shiao intends to reconstruct localism by wa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in mother tongue. Nevertheless, reconstruction does not lead to restoration. In her reconstruction, there always carries a hint of longing and expectation toward localism, which is vividly revealed through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s of her novels. When her novels reconstruct a local culture of kindness, innocence, forgiveness, and salvation through the purified language and the serene mood of the stories, she also constructs fictitiously a local culture herself.

Key words: Writing in mother tongu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Regional imagination, Reconstruction, Construct fictitiously, Language construction

責任編輯：陳淑芬